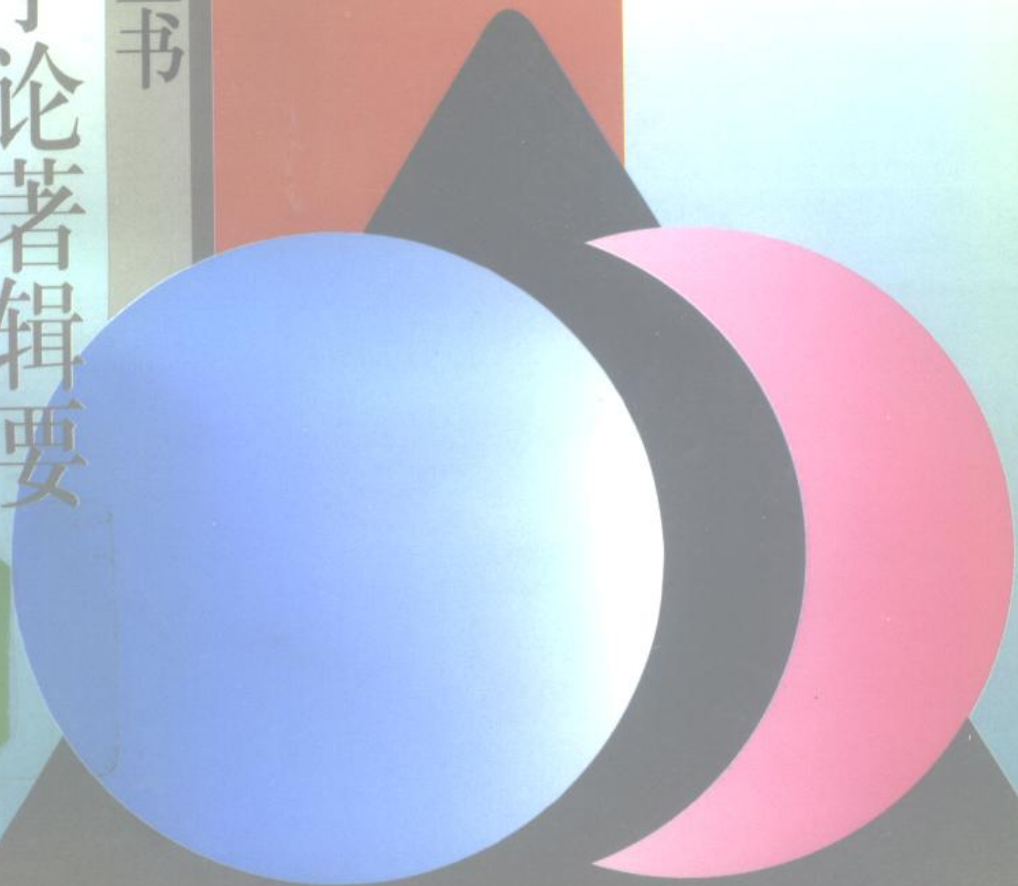


八五国家重点图书

默然不说 声如雷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马一浮新儒学论著辑要



B24425

90417

93417

DG03/24

——马一浮新儒学论著辑要

默然不说声如雷

滕 复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默然不说声如雷

——马一浮新儒学论著辑要

滕 复 编

责任编辑:罗林平

封面设计:李 萌

版式设计:张智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9 印张 374(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43-2179-6/G · 802

定价:19.00 元

(京)新登字 097 号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方克立

副主编 张品兴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克立	宋连昌	宋志明	余新华
张品兴	罗林平	郑大华	郑家栋
高聚成	徐少锦	焦树安	

总 序

五年前,“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在今天,它们不仅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书册中,而且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新热点。

现代新儒学本来是七十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经过了三十年奠基和发展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前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解放后,作为一个思潮和学派来说,因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而不可能在中国大陆继续存在和发展,它的阵地遂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而就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来说,现代新儒学并没有断绝薪火,在第二

个三十年它又经历了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更有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由于海峡两岸隔绝三十多年,国内的读者对这些情况均难以知悉,并在一再“批儒”的气氛中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隔膜。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域外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这种本来就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并以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为旗帜,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为宗旨的思想学说,自然不会放过回归本土的机会。主要是通过一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努力,积极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儒学复兴”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文化讨论的现实感受加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回顾使人们很快地接受了“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概念。

关于现代新儒学,现在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是由于研究刚刚起步,资料掌握还很不齐全,特别是对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学者,研究资料尤其匮乏,因此人们的认识难免是笼统浮泛的、很不一致的,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对象、范围、代表人物、发展阶段、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在认识上都颇多歧义。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开新,对近现代西学的融摄和“儒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敌视和某种意义上的启示;这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是怎样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它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是什么而限制又是什么,它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等等,都有待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

作出切实的回答。

对于一切研究者和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人来说,占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都写了和说了些什么乃是首要的前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精选的系统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它不同于国内已经出版的众多新儒学评论集、港台海外新儒家论文选集和新儒家个别著作的重印本,而是力图从反映整个思潮发展的角度,将现代新儒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作挑选出来,分别汇编成册,以便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新儒学思想的实质及其个性特征。为了帮助青年读者正确认识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各册编者分别撰写了“编序”,除了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有关思想资料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采取了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这套“辑要”所选的十五位作者,涉及“五四”以来的三代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但是都不乏上述“共性”。他们中的马一浮、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等人,能否归属于现代新儒家的范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里提供了一批反映其新儒学思想倾向的资料,特别是集中反映其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希望有助于对他

们的思想特质和精神方向作出符合实际的定性判断。当然这决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包含矛盾,不可能表现出多样的形态,但这些资料至少对了解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动摇,怎样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怎样更好地吸收别的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域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所以,这套“辑要”决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国现代思想文

化的名著。所选十五位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都堪称名家，把他们的代表作称为“名著”并非言过其实。当然，“名著”中所写的不见得都是真理，我们也不赞成“复兴儒学”的观点，但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来研究，包括它的错误亦能给人某种启迪。如果大家能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出版这一套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不容置疑的了。

方克立

1990年11月8日

编 序

一、马一浮的生平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幼名福田,后改名为浮,字一浮,另号湛翁,晚年自署蠲戏老人(蠲戏,取《法华经》“蠲除戏论”义),简称蠲叟,且曾先后用过被褐、太渊、宛委山人、服休、圣湖野老、夕可老人等笔名和别号。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成都。六岁时随亲出川返浙,寄寓杭州。马一浮天资聪敏,记力过人。少年时即文才斐然,卓越群伦。戊戌年(1898年)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应绍兴县试,马一浮高中榜首。因此深为浙江巨绅汤寿潜所器重,以女妻之。马一浮早年不幸,十一岁丧母,十九岁

丧父，二十岁丧妻。亲朋多劝其再娶，终不为动。尝曰：孔子子孙是濂、洛、关、闽，而不是衍圣公。遂终身不再娶，无嗣。

戊戌变法以后，科举渐废，新学兴起，马一浮为接受新学，与汤寿潜的受业弟子谢无量一起去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和日文。为唤醒民族，振兴中华，他与谢无量、马君武三人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月刊，翻译介绍斯宾塞等西方思想与文学，共出六期。后因赴美而停刊。1903年，马一浮因接连丧父、丧母之哀痛，思图远游。是年6月东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居圣路易，学习西欧文学；并曾纂《欧洲文学四史》，《诗人传》等。不过，马一浮出国并非主要因为个人的心境，主要是寻求救国的真理，希望从西方寻找中国自强之路。他在美国的一年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亚里士多德、但丁、拜伦、莎士比亚、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文学与哲学著作。他在读书之余，还翻译了《日尔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这期间，他还西游柏林，习德意志文学，回国时，他还带回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版），这是进入我国的第一部马克思的著作。1904年，马一浮自美国回国不久，为专门研究西方哲学，鬻家产，再赴日本留学。居西京习日文、西班牙文，并读马克思《资本论》、歌德《浮士德》及西方文艺诸书。期间，马一浮见国事艰危，为醒世觉民尝从日文译意大利人所著《政治罪恶论》登于《独立周报》。

1905年，马一浮从日本回国。从这时起直到辛亥革命后这段时间，他一边从事读书与著作，一边冷静地观察中国的时局，认真思索思想与文化等重要问题。马一浮先是与谢无量在

镇江焦山海西庵小住，刻苦读书。期间曾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珂德》，题为《稽先生传》，登于上海王无生所办的《独立周报》，笔名被褐。后居杭州广化寺和永福寺，埋头读书，尤其是广阅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甚有收获，这大大丰富了他的国学素养。同时他在这段时间还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马一浮尽管未参加任何革命团体，但很赞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早年在日留学时他就与章太炎和鲁迅等有多次接触。秋瑾、徐锡麟二烈士被害后，他曾满怀忧愤，赋有排律诗《悲秋四十韵》，以志悼惜。辛亥革命以后，不久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生益困。面对这种情形，马一浮当时同许多人一样，感到迷惘。他的弟子乌以风回忆说：“先生目睹国事之艰难，世道益苦，推求其根源，皆由于学术之大本未明，心性之精微难知。欲挽狂澜，转移风气，非自拔流俗，穷究玄微，不足以破邪显正，起敝扶衰。于是益加立志为学，绝意仕进，远谢时缘，闭户读书。”（《马一浮先生学赞》第二页）这清楚地说明了马一浮当时的心境。

马一浮治学早年自博览始，凡中土九流百家之学，汉宋经师之论，文史词章，小说杂记，无不涉猎，进而求其源委，明其旨归。而且于佛释经典、义禅教理以及道教玄学，亦莫不旁研兼通。同时，对于西学亦能择要例览，不为门户所宥。其中有段时期又热衷训诂考据，但之后又大悟其非。认为即使训诂严密，考据精确，于自己身心及民风政教了无干涉，可以成专家而不可以为通儒。由此又深入穷研诸子百家之说、佛老二氏之学，始明其中有精有粗，有得有失，皆不足备义理之大全，尽心

性之大用。于是始折而返求儒学，深契六经（参见乌以风《马一浮先生学赞》）。总之，大约从1905年回国一直到抗战前夕，马一浮在这三十年之间，基本可以说是隐迹林下，专心读书治学，并最终确立他的弘扬儒学的学术方向。民国初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曾礼聘马一浮为秘书长。马一浮到职不到三周，因不善官场应酬，同时又不愜于居高位者之所为，遂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辞之。以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后任陈大齐又曾先后礼聘，马一浮以为今之学校制度不同中土旧日书院，世之显学正以贩卖知识为重，以新说异论相尚。学校约聘，乃所以礼时贤，非所以待通儒。故耻为一往之谈，均答书辞谢。马一浮居陋巷，服布衣，一心读书治学，不求闻达，因此，不仅其高风亮节为士林所钦服，而且其渊博学识亦为学界所推重。当时海内学者由四方来西湖质疑问难者络绎不绝，来者莫不为马一浮的博学通论所叹服。其中与马一浮有交往的著名学者有梁漱溟、马彝初、汤用彤、熊十力、朱光潜、苏曼殊、李叔同等。

马一浮素不标讲学，不强著述。返归儒学后，其治学重在穷理尽心，见诸躬行。因此这期间马一浮没有多少著述。主要有编辑整理明朱之瑜《舜水遗书》四种二十八卷，附录一卷；著有《老子道德经注》（未注完）；以及为一些学者、禅师友人撰写的各种序、跋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一浮由杭避寇南迁，初居桐庐，转开化，不久因寇患日迫，乃随浙江大学入赣，居泰和。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这段时间是马一浮一生中最重要的时

期。这段时期,马一浮不仅出来公开讲学,并且在讲学过程中形成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

首先是讲学。马一浮居泰和时,忧世心切。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大师名义礼聘他,经朋友敦劝,以天下学术为重,不可自隐太过。于是马一浮应聘,出来公开讲学。马一浮在泰和讲论,以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教为宗旨,系统讲述其关于“六艺赅摄一切学术”之学说,鲜明地阐述了其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立场,主张儒家六艺之学为中外一切学术源头和发脉处。并且认为人类各种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最终必将以儒学精神为其旨归。马一浮称自己的这一讲为“六艺论”。马一浮在泰和演讲,除了“六艺论”外,还有“义理名相论”的演讲。“六艺论”可以看作是马一浮的文化观,而“义理名相论”则是马一浮的哲学。他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基本思想。马一浮的泰和讲论,是他三十年治学的基本思想成果,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938年浙江大学为避寇患由赣入桂,迁至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讲其“义理名相论”,凡六讲。至此,基本完善了他的“义理名相论”的哲学体系。

1939年,马一浮入川,应国人礼聘于乐山参与筹创复性书院,专事讲学,任主讲。9月书院开讲,马一浮首标书院讲学宗旨,以讲明儒学经术义理为主。对于为何要创设书院并冠以“复性”之名,马一浮曾有说明:“学术之所以分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复则无妄,无妄则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

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书院讲学以复性为旨趣，以讲明六艺为教。治六经之学，必以六艺义理为主。六艺赅摄一切学术，故书院不分诸科，但分通治、别治二门。通群经大义为通治，专治一经为别治。”（乌以风《马一浮先生学赞》引）可见，复性书院并非一般的学校或研究院，而极类明清时期的书院，当然也并不完全相同。马一浮希望书院能以讲论儒学为主，并兼明其他学问；因此，马一浮初订书院学科，曾欲设四学：（一）玄学，（二）义学，（三）禅学，（四）理学。他说：“先德多出入二氏归而求之六经。佛老于穷理尽性之功，实资助发。自俗儒不明先儒机用，屏而不讲，遂使圣道之大，若有所遗。墨守之徒，不能观其会通，渐趋隘陋而儒学益衰。今当一律解放，所学者自由研究，故特设此四门，使明四学源流，导以正知正见。”（同上）另外，马一浮还希望在四学之外，再设西方哲学一门。尽管后来这些设想未能如愿，但其学术旨趣可从中见得一斑。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独自承讲六经大义，凡六年。其间曾因不满当道者所为，一度罢讲，专事刻书。1942年，书院刻书费被停发，为筹集刻书基金，马一浮曾写有《鬲戏斋鬻字刻书启》，以鬻字刻书。在马一浮的主持下，复性书院先后刻有《群经统类》、《儒林典要》等丛书共二十八种，三十八册。1945年抗战胜利，翌年马一浮返杭。经复性书院董事会再三挽留，马一浮勉受书院以主讲兼总纂聘，但表示不受书院修敬，全部捐作刻书资金。回杭后不久，随书院住里西湖葛荫山庄，继续从事讲学和刻书。

马一浮的主要著作均是在复性书院经由他的弟子整理之

后刊刻出版的。其中包括：《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濠上杂著初集》（包括《太极图说科判》、《太极图说赘言》，以及《尔雅台答问补编》二卷）。复性书院期间，还刊刻出版了马一浮的大量诗作。其中包括马一浮 1937 年以前的诗作《蠲戏斋诗前集》；1937 年避寇南迁时之诗作《避寇集》；1939 年至 1946 年的诗作《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贻》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一浮 67 岁。他历经满清末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考察过北美、德意志、日本、新加坡等各国，学习和研究过本国和西方的文化与哲学，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有深刻体会与了解，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之未来充满希望。马一浮在旧社会不慕荣利，不求化进，对官场所为深恶痛绝。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他十分器重，对他的生活也十分关怀。1951 年 4 月，陈毅同志拜访了马一浮，并进行了畅谈。马一浮自此接受公职，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 年又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1954 年以后历任第一、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4 年马一浮去京开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邀他同桌共餐。1957 年周恩来总理陪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杭，曾去探望马一浮先生，并在他的蒋庄寓所合影留念，称他为“中国现代唯一的理学家”。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马一浮十分感激，曾作有诗联赠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赠给毛主席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总理的诗联

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解放以来，马一浮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青春焕发，创作了大量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诗作。其中有《志愿军受创者归国有感》、《观菊展》、《警吏尊》、《公社化》、《学雷锋》、《喜闻核试验成功》、《观新安江发电站》等佳篇，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马一浮于金石书法艺术上造诣很深，无论甲骨文、钟鼎文、汉隶、魏碑，都深下工夫，其书法独创一格。1963年马一浮八十一岁时，曾将其手临碑帖和各体书法精品一百多种捐献给全国政协。马一浮一生治学，藏书甚丰，晚年曾立下遗嘱，辞世后将藏书全部献给国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马一浮也受到很大冲击，第二年终于郁积成疾，一病不起。临终前作《拟告别亲友》一诗曰：“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沕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二、马一浮的学术文化观

马一浮于中西学术思想与文化浸润多年，而最终回归儒家学术思想。他的学术观旨在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重新确立儒家思想文化在整个传统思想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思想文化中心崇高地位，并在这种弘扬与确立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观以及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中西文化关系等一系列的看法。

（一）“六艺赅摄一切学术”